

胡适文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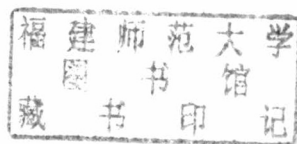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集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胡适文存

第二集



1063660



T1063660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文存. 第2集/胡适著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 2013. 3
ISBN 978 - 7 - 5638 - 2062 - 7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胡适(1891 ~ 1962)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2115 号

胡适文存(第二集)

胡适 著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印 刷 北京地泰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567 千字
印 张 32.75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062 - 7/C · 100
定 价 73.00 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前言

本集以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 年第 6 版为底本,参考其他版次及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53 年版编校而成。原书书名《胡适文存二集》,初版于 1924 年 11 月,收录的文章大都写于 1922 年 1 月到 1924 年 9 月之间;这些文章当时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,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。

原书系繁体字竖排,现改为简体字横排。民国时期有其语言习惯,作者也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。鉴于原书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,只是当时的标点符号与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有区别,编校工作中,除订正个别文字错讹,并按现行规范用法修改少许标点符号之外,本次出版基本未作其他增删改动。原书中出现的不少书名、专业术语尤其是译名(人名及地名等)与今不同,还有一些当时流行或通行但现今已不通行的词汇,本次出版也从旧;个别作了更改的地方,均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了编者注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将原竖排繁体改横排简体后,原行文中所出现的诸如“左列”、“右列”字样,现按横排相应改为“左(下)列”、“右(上)列”,请读者留意。

目 录

1 / 序

卷一

- 5 / 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
- 15 / 发起《读书杂志》的缘起
- 16 / 王莽
- 21 / 记李觏的学说
- 34 / 费经虞与费密
- 60 / 读《楚辞》
- 65 /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
- 72 /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
 - 79 / 附录一 《清华周刊》记者来书
 - 80 / 附录二 答书 胡适
 - 81 / 附录三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梁启超
- 100 / 梁任公《墨经校释》序
 - 104 / 附录一 梁任公先生来书 梁启超
 - 106 / 附录二 答书 胡适
- 108 / 论墨学
- 114 / 《章实斋年谱》自序
- 117 / 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序

卷二

- 125 / 《科学与人生观》序
 - 136 / 附录一 陈独秀先生序 陈独秀
 - 141 / 附录二 答陈独秀先生 胡适
 - 142 / 附录三 答适之 陈独秀
- 146 / 孙行者与张君勔

- 148 / 读梁漱溟先生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
160 / 附录一 梁漱溟先生第一次来书 梁漱溟
161 / 附录二 答书 胡适
162 / 附录三 第二次来书 梁漱溟
163 /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
213 / 附录 日本译《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》序 胡适
214 /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
-

卷三

- 249 / 十七年的回顾
253 / 祝《白话晚报》
254 / 黄梨洲论学生运动
257 / 《政治概论》序
261 / 《天乎帝乎》序
262 / 我们的政治主张
265 / 附录 关于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的讨论
287 /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
291 / 附录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陈独秀
295 / 一个平庸的提议
300 / 一年半的回顾
305 / 与一涵等四位的信
307 / 这一周
-

卷四

- 367 / 吴敬梓年谱
388 / 《西游记》考证
411 / 附录 《读〈西游记〉考证》 董作宾
416 / 《镜花缘》的引论
437 / 跋《红楼梦考证》
443 / 附录 《石头记索隐》第六版自序 蔡元培
447 / 《水浒续集两种》序
458 / 《三国志演义》序
463 / 高元《国音学》序
466 / 赵元任《国语留声片》序

469	/	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
475	/	《中古文学概论》序
478	/	评新诗集
487	/	《尝试集》四版自序
490	/	《蕙的风》序
496	/	歌谣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
502	/	北京的平民文学
507	/	附录 谈北京的歌谣 常惠
513	/	《国语月刊》“汉字改革号”卷头言
515	/	读王国维先生的《曲录》

序

《文存》的第一集，是十年十一月结集的。三年以来，又积下了五十万字的杂文。亚东图书馆里的朋友们帮我编集起来，成为《文存》第二集。汪原放先生特为此事远道跑来北京，住在我家里逼着我编定目录；章希吕、余昌之两先生担任校对——这都是我应该道谢的。

我本想分作四卷，第一、二卷为讲学之文，第三卷为论政治之文，第四卷为杂文。但因为文字的长短、每册的厚薄，竟不能严格地拘守这个区分。有几篇稍长的讲学文字，如《崔述的年谱》，如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因未完篇，故不曾收入。因此，卷一与卷四不免有截长补短、互相移动的痕迹。

卷三的政治文字，大都是迁就朋友的主张，勉强编入的。《这一周》的短评，本无保存的价值。因为有朋友说，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，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。

卷二里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和《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》两篇，原是为《申报》五十年纪念册做的；《申报》馆另出有单行本。《申报》馆许我重印的好意是很感谢的。

这一集里也收有几篇三年前的旧作，也有一两篇是不曾发表过的。《费经虞与费密》一篇，是用旧稿《记费密的学说》，从头改作，比旧稿增多不止十倍了。

《文存》第一集出版时，我曾说：

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，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，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：只有这两点可以减少我良心上的惭愧。

我现在拿这两点来审查这第二集，觉得还不至于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。所以我还用这两句话来介绍这几册文字给我的读者罢。

十三，九，廿三 胡适

胡適文存

第二集

卷一

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

近年来,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,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。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,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。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,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,“古学要沦亡了!”“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!”

在这个悲观呼声里,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。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,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。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,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,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。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,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。至于那些静坐扶乩,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,更不用说了。

在我们看起来,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;这些行为,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,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。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,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!

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,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,我们不但不抱悲观,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。我们深信,国学的将来,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;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,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。

自从明末到于今,这三百年,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。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,可分这些方面:

(一)整理古书。在这方面,又可分三门。第一,本子的校勘;第二,文字的训诂;第三,真伪的考订。考订真伪一层,乾嘉的大师(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)都不很注意;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,但方法还不很精密,考订的范围也不大。因此,这一方面的整理,成绩比较的就最

少了。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。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阮元、王引之们的治“经”，钱大昕、赵翼、王鸣盛、洪亮吉们的治“史”，王念孙、俞樾、孙诒让们的治“子”，戴震、王念孙、段玉裁、邵晋涵、郝懿行、钱绎、王筠、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，都有相当的成绩。重要的古书，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，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。我们试拿明刻本的《墨子》来比孙诒让的《墨子闲诂》，或拿二徐的《说文》来比清儒的各种《说文》注，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。

(二)发现古书。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，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，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。清代中央政府，各省书局，都提倡刻书。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：丛书与单行本、重刊本、精校本、摹刻本、近来的影印本。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。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、元词集，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？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，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，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。翻刻古书孤本之外，还有辑佚书一项，如《古经解钩沉》、《小学钩沉》、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和《四库全书》里那几百种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佚书，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。

(三)发现古物。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；风气所被，遂使古物的发现、记载、收藏，都成了时髦的嗜好。鼎彝、泉币、碑版、壁画、雕塑、古陶器之类，虽缺乏系统的整理，材料确是不少了。最近三十年来，甲骨文字的发现，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，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。最近辽阳、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，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。

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，在今日估计起来，实在还有许多缺点。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，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，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。那些缺点，分开来说，也有三层：

(一)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。这三百年的古学，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，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，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，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。古韵的研究、古词典的研究、古书旧注的研究、子书的研究，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。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！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，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，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，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，那是不可讳的事实。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。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，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，甚至于治一部《诗经》还要舍弃东汉的《郑笺》而专取西汉的《毛传》。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；但清儒狭小

研究的范围,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。他们脱不了“儒书一尊”的成见,故用全力治经学,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。他们又脱不了“汉儒去古未远”的成见,故迷信汉人,而排除晚代的学者。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,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;所以他们力排郑樵、朱熹,而迷信毛公、郑玄。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,但他们打倒了东汉,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。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。三五部古书,无论怎样绞来挤去,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。打倒宋朝的“道士《易》”固然是好事,但打倒了“道士《易》”,跳过了魏、晋人的“道家《易》”,却回到两汉的“方士《易》”,那就是很不幸的了。《易》的故事如此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三礼》的故事也是如此。三百年的心思才力,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!

(二)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解。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: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,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。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,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。清儒有鉴于宋、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,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。这三百年之中,几乎只有经师,而无思想家;只有校史者,而无史家;只有校注,而无著作。这三句话虽然很重,但我们试除去戴震、章学诚、崔述几个人,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。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(乾隆,1736~1795;章学诚,1738~1800),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:

今之博雅君子,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,而终身无得于学者,正坐……误执求知之功力,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。学不可以骤几,人当致攻乎功力,则可耳。指功力以为学,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。(《文史通义·博约》篇)

他又说:

近日学者风气,征实大多,发挥大少,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。(《章氏遗书·与汪辉祖书》)

古人说:“鸳鸯绣取从君看,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”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,而不肯把金针教人,那是不大度的行为。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,多数人只爱看鸳鸯,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。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,始终不肯绣鸳鸯。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,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。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,然而全国的

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易本义》等书。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《古文尚书》，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《书集传》。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，二千四百三十卷的《经解》，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！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。

（三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。我们试问，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？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——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。宋、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，全因为六朝、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，宋、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，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。宋、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，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，从前看不见的，现在都看见了；从前不明白的，现在都明白了。同是一篇《大学》，汉、魏的人不很注意他，宋、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，把他从《礼记》里抬出来，尊为《四书》之一，推为“初学入德之门”。《中庸》也是如此的。宋、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，望着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便觉得“明明德”、“诚”、“正心诚意”、“率性之谓道”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。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，决意不配眼镜，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，同瞎子相差有限。说《诗》的回到《诗序》，说《易》的回到“方士《易》”，说《春秋》的回到《公羊》，可谓“陋”之至了；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，何以陋到这步田地，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？他们排斥“异端”；他们得着一部《一切经音义》，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；他们拿着一部子书，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。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，兜来兜去，始终脱不了一个“陋”字！打破这个“陋”字，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旁搜博采，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。

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，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。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，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。前人上了当，后人应该学点乖。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，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。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，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，应该注意这几点：

- （1）扩大研究的范围。
- （2）注意系统的整理。
- （3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。

（一）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？“国学”在我们的心眼里，只是“国故学”的缩写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，都是我们的“国故”；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，就是“国故学”，省称为“国学”。“国故”这个名词，最为妥当，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，不含褒贬的意义。“国故”包含“国粹”，但

他又包含“国渣”。我们若不了解“国渣”，如何懂得“国粹”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，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，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——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，认清了“国故学”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，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。例如治经，郑玄、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，王弼、何晏也占一个位置，王安石、朱熹也占一个位置，戴震、惠栋也占一个位置，刘逢禄、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。段玉裁曾说：

校经之法，必以贾还贾，以孔还孔，以陆还陆，以杜还杜，以郑还郑，各得其底本，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。……不先正注、疏、释文之底本，则多诬古人。不断其立说之是非，则多误今人。……（《经韵楼集·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》）

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。我们也可以说：

整治国故，必须以汉还汉，以魏、晋还魏、晋，以唐还唐，以宋还宋，以明还明，以清还清；以古文还古文家，以今文还今文家；以程、朱还程、朱，以陆、王还陆、王，……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，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。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，则多诬古人。不评判他们的是非，则多误今人。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，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。

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。在文学的方面，也有同样的需要。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，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。在历史的眼光里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，和《诗三百篇》有同等的位置；民间流传的小说，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，吴敬梓、曹霁和关汉卿、马东篱和杜甫、韩愈有同等的位置。故在文学方面：

也应该把《三百篇》还给西周、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，把《古乐府》还给汉、魏、六朝的无名诗人，把唐诗还给唐，把词还给五代、两宋，把小曲、杂剧还给元朝，把明、清的小说还给明、清。每一个时代，还他那个时代的特殊的文学，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。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，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。

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，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。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，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，一本石印小字的

《平妖传》和一部精刻的残本《五代史平话》有同样的价值,正如《道藏》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有同等的研究价值。

总之,我们所谓“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”,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,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。历史是多方面的:单记朝代兴亡,固不是历史;单有一宗一派,也不成历史。过去种种,上自思想学术之大,下至一个字、一只山歌之细,都是历史,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。

(二)怎样才是“注意系统的整理”呢?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,还须有系统的整理。系统的整理可分三部说:

(甲)索引式的整理。不曾整理的材料,没有条理,不容易检寻,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,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。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,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,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。例如一部《说文解字》,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,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,方才能用这部书。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。如果有人能把《说文》重新编制一番(部首依笔画,每部的字也依笔画),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(略如《说文通检》或《说文易检》),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。又如一部《二十四史》,有了一部《史姓韵编》,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?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,如章学诚说:

窃以典籍浩繁,闻见有限;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,况其下乎?校雠之先,宜尽取四库之藏,中外之籍,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,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,略仿《佩文韵府》之例,悉编为韵;乃于本韵之下,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;自一见再见,以至数千百,皆详注之;藏之馆中,以为群书之总类。至校书之时,遇疑似之处,即名而求其编韵,因韵而检其本书,参互错综,即可得其至是。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,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,非校雠之良法欤? (《校雠通义》)

当日的学者如朱筠、戴震等,都有这个见解,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,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,方才集合许多学者,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《经籍纂诂》,“展一韵而众字毕备,检一字而诸训皆存,寻一训而原书可识。”(王引之序)“即字而审其义,依韵而类其字,有本训,有转训,次叙布列,若网在纲。”(钱大昕序)这种书的功用,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,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,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。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,用作抄窍的工具,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。这是大错的。